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 后殖民理性批判

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著 严蓓雯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 后殖民理性批判

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著 严蓓雯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 / (印)斯皮瓦克  
(Spivak, G. C.) 著; 严蓓雯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5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ISBN 978-7-5447-2905-5

I. ①后… II. ①斯… ②严… III. ①后殖民主义-研究 IV.  
①D066



书 名 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  
作 者 [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译 者 严蓓雯  
责任编辑 许 昆  
原文出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369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905-5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维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

塔拉克·纳特·森

保罗·德·曼

## 前 言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本书目的是通过不同实践，即哲学、文学、历史和文化，追踪勾勒本土提供信息者（Native Informant）<sup>①</sup>的形象。但我立刻发现，这种追踪本身将一个自身不断与本土提供信息者脱离的殖民主体显示出来。1989年后，我开始感觉到，某种后殖民主体已经反过来在重新编码殖民主体，侵占本土提供信息者的位置。如今，全球化无往不胜，技术通信的信息学以本土知识的名义，直接染指本土提供信息者，对他们进行基因剽窃。<sup>②</sup>因此，我在第一章分析的“排除在

① 指为研究者提供语言或文化方面信息的人。——译注

② 指科学家或私人公司在没有尊重基因产地及本土居民培育基因的成果的情况下，私自为某种基因甚至是整个动植物资源申请专利，从而限制其他人包括基因产地本土居民使用该种动植物资源。这对于基因产地及本土居民来说，无异于盗窃了他们的动植物资源及智能成果，也限制了他们使用原本属于大众、无所谓产权的动植物资源。比如美国一家稻米公司把印度香米与另外一些矮秆稻米品种杂交，并成功为这种新品种的印度香米申请专利，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独家出售，亦限制其他人采用相似技术培育印度香米。印度香米原本只能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种植。过去，印度农民一直使用和培育不同品种的印度香米，以配合不同的环境和气候。印度香米既是他们的本土资源，也是他们的智能成果。美国稻米公司不仅没有肯定他们的智能成果，更通过没有丝毫新意的培育技术，盗取了印度香米的名称，还限制了印度农民培育印度香米，同时，也对印度出口市场构成很大的威胁，破坏农民生计。最后，在印度政府的要求下，这家公司终于放弃这些专利，还了印度农民一个公道。该解释参考<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

外” (foreclosure)<sup>①</sup> 这一行为，不但在持续，而且变本加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生命保障系统百科全书》，将人类历史的土著期“定义”为“远古……的时段，与无反应的态度关联，这些态度毫不关注环境恶化及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对土著来说，他们当然不可能思考什么可持续性，就像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因为“内在于[他们]生活中的社会的历史局限”，他也难以“破译……价值表达的秘密”一样。<sup>②</sup> 然而，土著那种按生态生物群落节奏生活的实践哲学，现在却必须因“不关注”而遭摒弃。

ix 在这种对抗性态势的冲击下，本书描绘了一个研究者从研究殖民话语到研究跨文化的历程。后一个立场，也就是我写作此书时——它试图捕捉正在消失的当下——所立足的“移动基地”，在叙事性的注脚中宣布了自身的存在。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点让人恼怒或困惑；但我也希望有读者能够共享这一挑战。我在第四章里揭露出的隐含读者面目如此之多样，很难说他们共有一个明确的兴趣和确定的基础。基于自身不确定的学术取向，有时我也会为新的文化研究召唤出提供信息知识的读者。本书还试图探讨那些理论精英以及自称学院派的“专业人士”的“被认可的无知” (sanctioned ignorance)。这些认可也各自出处不同。因此，读者的位置和作者的位置一样并不稳当。但是，难道这不是所有文本的状态吗？虽然在写作和阅读中，我们一直抵抗这种状态。

---

search?q=cache:zo8cDnp3koMJ:www.cyberschool.oxfam.org.hk/glossary.php%3Fcod%3D9+biopiracy&cd=4&hl=zh-CN&ct=clnk&lr=lang\_zh-CN%7Clang\_zh-TW&source=www.google.com.hk。——译注

① “foreclosure”本指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即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行为。含有不承认某样东西曾经存在，从而将之排除在外之意。作者所指的意义在本书第4页（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下同）有详细阐释。——译注

② 《生命保障系统百科全书：概念框架》（*Encyclopedia of Life Support Systems: Conceptual Framework*, Whitstable: Oyster Press, 1997, p. 1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 Ben Fowkes,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76, p. 152）。



第一章考察哲学：康德如何将土著排除在外；黑格尔如何将欧洲的他者放在标准偏差的模式之中，殖民主体如何让黑格尔得到净化；马克思如何克服差异问题。

第二章读解了以下作家的文学文本，以显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如何被刻画：勃朗特、玛丽·雪莱、波德莱尔、吉卜林、里斯、玛哈丝维塔、库切。在我的读解中，玛丽·雪莱和最后提到的三位作家，都没有将他性的伦理（ethics of alterity）展现为一种身份政治：这为我们的斗争上了一课。如今，在那清单上，我至少会加上牙买加·金凯德的《露西》，这是一个并列结构的有力文本，丝毫没有失去反抗剥削者的尖锐锋芒，因为它敢于在结尾通过一个超越其选择的他性，消解中心人物的专有名称，以致可以用虚拟语气要回主体被拒绝拥有的爱的权利/责任，这主体希望能从受害者状态中选择行动权。

第三章通过档案勾勒19世纪印度山区王国皇后的经历，思索当时寡妇殉葬的处置。我也许应该提到，这是对最初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阐释》（*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ited by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一书中《属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这篇文章的修订。

第四章考察后现代时尚和女人在织品/文理（textile）史中的地位。

除了《属民能说话吗？》这篇文章，本书部分内容的早期版本曾出现在以下书刊中：《舍摩国王妃：读解档案》（“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History and Theory* 24, no. 3, 1985: 247—272）；《三个女性的文本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Critical Inquiry* 12, no. 1, Autumn 1985: 243—261）；《帝国主义和性差异》（“Imperialism and Sexual Difference”，*Oxford Literary Review* 1, 1986: 225—240）；《边缘的诸版本：库切的〈福〉如何解读笛福的〈鲁滨孙漂流

记》/《罗克珊娜》》”(“Versions of the Margin: J. M. Coetzee’s *Foe* reading Defoe’s *Crusoe/Roxana*”, in *Consequences of Theory*, edited by Johnathan Arac and Barbara Johns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4—180); 以及《时间与时机：法律与历史》(“Time and Timing: Law and History”), 最初发表于《时间型态》(*Chronotypes*, edited by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1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并获得原出版者许可。

这些章节并非各自为政。它们松散依附于一根链条,也许可以如此形容:支配者(dominant)的哲学假设、历史挖掘和文学表达——新兴后殖民共有这些元素——也勾勒出本土提供信息者(土著及/或属民)潜在的、不连续的出现。这不是通过“第三世界文学”的言说、书写和形象所表达出来的一个比喻。它如何将自身从不可能的视角,转移为抵抗的网络以及过度剥削的对象,是故事的一部分。织品/文本(text-ile)之未决性中似乎包含着一个尾声。在叙事中,这根链条时常切断——但是,我希望切断的线索会重又出现。

这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在第一章中,女性主义议题处于“前生成”(pre-emergent)(雷蒙·威廉斯<sup>①</sup>之语)状态。它们是其余部分的主旨。在第四章中,我对当代文化主义普世主义的女性主义做出了批评。

这本书在上架时,应与贝尔·胡克斯、堪蒂尤逊(Deniz Kandiyoti)、凯图·卡特拉克、卢比昂诺(Wahneema Lubiano)、郑明河、莫汗娣、王爱华(Aiwah Ong)和苏拉蕊(Sara Suleri)的书放在一

---

① 雷蒙·威廉斯(1921—1988),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在讨论整体文化与文化产品如文学作品的关系时,要认识到文化变化过程及历史内在的延续性。任何社会的文化系统都是多元并存的,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各种文化因素的重组过程,既有主导的文化因素,也有过去的社会文化延续残存着的文化因素,还有酝酿潜伏着的新文化因素。——译注

起。在写作本书的数年间，这些女性及我在此没有提名道姓的其他人，大大推进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苏拉蕊和我更多关注主流文本。这些学者的著作和我的著作之间那未被承认的相似性，是我们投身同一种斗争的证明。

但是，即便在我试图探寻什么样的属民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组织的抵抗之外时，我仍更多地关注主流文本。我们所栖身的女性主义，与主导文化的传统有某种关联，即使两者互相敌对时也是如此。莫汗娣在其新书中专辟一章精彩论述了自我就业妇女协会（SEWA）。<sup>①</sup> 埃拉·巴哈特女士在尚为年轻律师时，不顾领导人反复警告：“但你怎么组织她们？这些女人没有老板！”——创立了“自我就业”这一门类，作为她那独特的革命计划的第一步，她得以劝诫这些妇女存入最少的钱，以建立一个账户。否则，她们就仍会被策略性地排除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之外。而如今，我却听说，在被问及世界妇女银行在做什么社会工作时，阿玛特罗德反复提到自我就业妇女协会，并引证说，自我就业妇女协会的钱德拉·本恩握着她的手说，世界妇女银行是她们的恩人！我相信，在认识世界的时候，训练一种文学思维习惯，而且只有当这种训练并不认为承认共谋不省时，它可以尝试限制那种超级强权的必胜信念。因为我的这本书审视了后殖民理性之生产的结构，因此是种“批判”。

如果这种强权不减其强健，我们就在两个问题间左右为难：一边是支持“向上层阶级流动——模仿和装扮——就是直接抵抗”这种思想的各种理论（不管这些理论如何被巧妙论证）；另一边是没能“认识

---

<sup>①</sup> 莫汗娣，《女工与资本主义书写：统治的意识形态、共同利益和团结政治》（Chandra Mohanty, “Wom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 Scripts: Ideologies of Domination,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Solidarity”, in M. Jacqui Alexander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eds., *Feminist Genealogies, Colonial Legacies, Democratic Fu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26—27）。

到……那一时代已经过去”，“在那一时代里，西方尤其是美国愿意宽容第三世界的修辞”。<sup>①</sup>教授文学阅读的教师的任务因此是：当师生一起反复讨论“免于……的自由”和“有权享有……的自由”时，要艰难地、以非强制性方法重新理出这种诉求的脉络，而不是单纯肯定对美国阶级权力的诉求就是直接抵抗。

xii 因此，尽管艾哈迈德<sup>②</sup>和我都批判大都市的后殖民主义，但我仍然希望我的立场稍微不那么地方主义，而是更细腻，更具建设性，坦承共谋。我总是想在下判断前慎重考虑，像别人将会看待我们那样看待自己。但是，这不是意在停工，而是让这工作不那么褊狭排外。我从解构中不断学到的东西也许有某种异质性，但它仍是我自己的特色。

xiii 我并不足够博学，可以跨越多个学科，但是我可以打破规矩。从这一点中，你可以学到什么吗？我这么问我以前的两个学生夏普和派尔，本书的早期篇章以课堂教学形式出现，他们陪我一起探讨了其中大部分内容。而最后，我要感谢以下三位让有机会学到其他学问的朋友：  
玛哈丝维塔、法里达和法哈德。

---

① 詹姆斯·特劳布，《安南的下一考验》（James Traub, “Kofi Annan’s Next Tes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9, 1998, p. 46）。

② 艾哈迈德，印度左翼理论家。——译注

#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哲学	001
第二章 文学	116
第三章 历史	208
第四章 文化	323
附录 解构开始工作	437
索引	449

# 第一章

## 哲 学

无意中铭记了一样失落之物的后殖民研究，除非被放在一个总体框架中，否则就有可能成为无罪辩词。当殖民话语研究只关注被殖民者的表达或殖民问题时，它们有时会通过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安全地放置在过去，以及/或者通过假设从古至今有一条持续不断的线索，为当下新殖民知识生产服务。这种情形使得以下事实更为复杂：后殖民/殖民话语研究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分支学科限制区。尽管这些研究有被招安的可能，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它们不能提供持久的疏浚，那看似清澈的学科主流就会混浊不堪。因为，当这种疏浚工作不断对充分意图主体进行自以为正义的羞辱时，它是反生产的，所以解构在此就有作用。（尽管德里达反复援引学科问题和欧洲意识危机，但他利用解构达到这些目的的少数尝试，并不被人认为与解构文学或哲学批评有密切关系。这并非偶然。）<sup>①</sup>

<sup>①</sup> 有关学科问题，见《谁怕哲学？》（*Qui a peur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Flammarion, 1977）；《理性的原则：学生眼里的大学》（“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he University in the Eyes of Its Pupils”, *Diacritics* 13.3, 1983）和《杠杆：或学院的冲突》

主流从不清澈，也许也永远无法清澈。部分主流教育包含了一门学问，就是用一种“被认可的无知”，完全忽略这一点。因此，在开篇第一章，我解读西方哲学传统里三本重要著作，这些著作都认可了无知。

在《三个世界》的结语中，卡尔·普莱奇这么说：

我们的挑战并不仅是将社会科学在概念上的确定次序行为（分为三个世界）扔在一边，而是要批判它。而且，我们必须明白，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批判任务在此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战胜三个世界这种观念必然强加在社会科学上的限制。<sup>①</sup>

要表明前苏联解体后世界中的新南北划分如何强加了新的限制，  
2 在此书讨论范围之外，尽管我的论点将不断试图偷偷越线。<sup>②</sup>但是，我

---

（“Mochlos; or,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 in Richard Rand, ed., *Logomachia*, Lincoln: Univ. of Nebraska Press, 1992）。除了第二章讨论的文本，以下文章最有力地提出了帝国主义问题：《种族主义的遗言》（“Racism’s Last Word”, *Critical Inquiry* 12, Autumn 1985: 290—299）和《反思原则：尊敬的曼德拉》（“The Laws of Reflection: Nelson Mandela, in Admiration”, in Derrida and Mustapha Tlili, eds., *For Nelson Mandela*, New York: Seaver Books, 1987）。事实上，在最后一篇文章中也可以找到我在这段和本书里的论点，即第三世界主义/殖民话语形成的批判以不在场证明的形式，无意中“表（证）明”了新殖民主义正在做和早已做过的事情：“[一个现代国家机构所]恰当行使的行为，必须制造出（宣布）它以一种证实行为的形式所纯粹声称的、宣告的、确保其描绘的东西……它不能让自己被遗忘，就像建立在种族屠杀或类似大屠杀的事件之上的国家”（第18页；英译文有改动）。写作最初也是如此。德里达的后期著作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我在整本书的文本及注释中指出了这一轨迹。

① 卡尔·普莱奇，《三个世界，或社会科学劳动的分野，1950—1975》（Carl Pletsch,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3.4, October 1981: 588）。

② 这句话是在最后修订一开始写的，作者在南北方之间来回穿梭的当下活动让它有点混乱。这本书是“研究者从殖民话语研究进入跨文化研究的历程”。因此，我在最后一章里记录道，以全球化的、电子化的、虚拟化的女性的名义，我的研究超越了我能把握的东西，禁止越界的警戒标志也开始让路。注释变得更长、更具叙事性，开始挤入文本。对

们也许可以认为，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普莱奇写到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如果能认识到，殖民主义将自己彻底替换成新殖民主义时，也将旧殖民地替换为“第三世界”，就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对那个过程的理解。

（我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总是指主要以经济而不是领土为基础的帝国主义事业。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区别对历史学家来说非常关键，但在此并不是最为重要。）前苏联解体后的形势，将这种叙事移入全球金融化的社会力量中。<sup>①</sup>这种“宏大叙事”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力量的运作原则，而在美国学界的我们也参与到这一叙事中。这正是为什么也许以下认识会很有趣：认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久远的话语论述的先驱，而不是认为他们的思想储存了清楚明晰或有根有据的“理念”。<sup>②</sup>我 3

那些对解构感兴趣的人来说，鉴于我总是不时严厉抨击那必需却难以忍受的模式，我会问他们：这是《分界线》和《割礼告解》里有意研究的东西的通俗版本吗？[德里达，《在分界线生活》（Derrida, “Living On/Border Lines”, in Harold Bloom et al.,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 pp. 75—176）和《割礼告解》（“Circumfessions”, in Derrida and Geoffrey Bennington, *Jacques Derrida*,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3）]

① 因此，工业（尤其是后工业）资本主义如今是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阻挠性延异（différance），它是金融资本市场的世界贸易。注意到这种延异，就是向德里达学习；然而德里达自己对这两者之间差异的坚决忽略，却在这延异中被捕获。如果用一种提前脚注来表示的话，这与某种被称为“解构”的东西的内在/外在关联，也是本书写作的驱动力之一。[有关对此意义上“阻挠性”的阐释，参见马克思对资本三个循环之间的关联的说明（马克思，《资本论》，tr. David Fernbach, New York: Viking, 1979, vol. 2, 第109页及其他各处）。有关对此意义上“延异”的阐释，参见德里达，《延异》（Derrida, “Differance”, in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 Alan Bas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17）。]我们必须与这一奇怪的“事实”——延异不会有一个“意义”——真正地较劲，而不只是用嘲讽来掩饰我们对这个词汇并不完全理解。有关德里达对工业和金融之间差异的明显漠视（或忽略），见斯皮瓦克，《德里达研究马克思的局限与开放》（Spivak, “Limits and Openings of Marx in Derrida”, in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97—119）以及《捉刀》（“Ghostwriting”, *Diacritics* 25.2, Summer 1995: 65—84）。

② 就像一贯及通常所是的那样，我发现米歇尔·福柯在《知识考古学》（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2）第三章提出的“话语构成”这个（后来不太可信的）概念非常有用。所谓“话语



一直希望，一些读者会因此发现在我们自身立场与他们立场之间，存在一种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共谋关系，因为在辩解与指控、蹉浑水与抹黑之间，常常似乎别无选择。

随着时代发展，研究康德和马克思的成果越来越多，欧洲话语生产和帝国主义公理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变化，尽管后者持续扮演着“使话语主流显得更为清澈，使自身显得是唯一可协商方式”的角色。在永不停歇的运转过程中，伟大文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极其需要一个不可被承认的要素，我将称之为“本土提供信息者”；但这一要素被这个过程排除在外。

我从拉康心理学中借来了“排除在外”这一术语。我认为心理分析是一种将叙事的“前生成”（雷蒙·威廉斯的术语）解读为伦理实例的技术。<sup>①</sup>让我以“排除在外”一词为条目，简单描绘一下这种技术，在《心理分析语言》一书论述弗洛伊德到拉康的章节中，“排除在外”仍然是一个相当有用的通用词。<sup>②</sup>我的隐含读者将在第四章中显示她自身，而她将必须学会参考专门词汇的用法。

正如《心理分析语言》一书指出的：

拉康突出指出的这一感觉……比如说，可以在弗洛伊德……[关于]“某类更有力且更成功的防御。在此，自我不仅抵制[*verwirft*]不相容的观念，也否认其影响，它表现得似乎这个观念从未在自我身

---

生产”，我认为它处于“表述[*énoncés*]之形成及转化的一套体系”的条件或结果中（Foucault, *Archaeology*, p. 130）。

① 我已经在《回声》（“Echo”，in Don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eds., *The Spivak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78 and *passim*）一文中讨论过这种方法。这章稍后我会重复那一总体观点的部分内容。

② 拉普朗什和彭塔力斯，《心理分析语言》（Jean Laplanche and J.-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tr.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Norton, 1974, pp. 166—169）。所有关于“排除在外”的引文均出自这几页。